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30

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①

戴军¹, 娄小平²

(1. 湖南文理学院 师范教育部; 2. 湖南文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中国古代的大学是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 这些机构或曰大学或另有其名。古代传统大学的文化积淀是从“明人伦”、“修己治人”到“化民成善”, 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 再到“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 传统大学文化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以及重“道”轻“器”等显著特点, 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的底色。现代大学文化可以借鉴其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伦理人文的教育理念、“道”“器”融合思维方式等。

关键词: 大学缘起; 传统大学; 文化特色; 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5)05-0173-06

Enlightenments of Ancient China's University Culture for Modern Times

DAI Jun¹ & LOU Xiao-ping²

(1. Department of Teachers'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university refers to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also calls Da Xue. Besides that, there are some other names for university in feudal China, such as *Zhaixiaxuegong*, *Taixue*, *Guozijian*, *Shuyuan*, etc. Cultural accumu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re from ethical civilization, self-cultivation and virtue cultivation to develop goodness, value Confucianism, and use the education principle whose nature is reason. Then it appears Neo-Confucianism, ethics as the reason and assistance to common peopl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culture lays emphasis on social orientation, humanity-ethic, and principle, and so on. As time goes on, tho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present different feature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spirit.

Key words: the origin of university; traditional university; cultural features; cultural accumulation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但有类似的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 在不同历史时期名称不一: 如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它们建立在以手工业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和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 以传授封建伦理道德, 封建国家管理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 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 只有少数统治阶级子弟才能进入这样的机构享受教育。其目的在于“明人伦”、“通经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即“修己善群”、“明体达用”, 培养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基于大学的基本特征以及本文研究的需要, 本文所指的大学是泛指传播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或机构, 这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这类机构虽然缺乏现代意义的大学制度及大学校园环境, 但它们之中孕育

① 收稿日期: 2015-02-17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253); 湖南文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文化强国视阈下的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共生研究”

作者简介: 戴军(1973-), 男, 湖南武冈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了中国大学文化的胚芽,含有我们今天建设大学文化的宝贵财富。本文按照历史线索对中国古代大学及其文化进行梳理。

1 中国大学的缘起及大学精神文化变迁

殷商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王制》记载:“虞氏善国老于上庠,夏后氏善国于东序,殷人善国老于右学。”上庠、东序、右学这三种机构都是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西周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名称叫“学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高等教育机构不只由官府设立,私学并起,百家争鸣。孔子是中国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又很正规,有教学活动的“堂”,有学生居住的“内”,他还根据学生不同情况和特点实行分科教学,先后有学生二三千人,贤者七十二。这时期著名的私学,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还有比孔子稍后并与孔子齐名的墨子,到战国时期,私学教育仍不断发展。如孟轲的私学规模很大,齐国的淳于鬯“诸弟子三千人”。田骈在齐办的私学规模也很可观,等等。这些私学传授相对高深的知识,同时,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具有一定学识基础和道德修养的成年人,因此这种私学不是进行一般的基础文化教育和私塾,而是一种私立高等学校。

秦汉三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较为正式的官立高等教育机构——太学,它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大规模、建立最早的官立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汉灵帝刘宏光元年(公元178年)在洛阳建立起了鸿都门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学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学院。还有东汉的四姓小侯学;隋唐时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种类型的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唐朝中央政府设立的“六学二馆”和众多的专科学校^[1]。这一时期,与官立高等机构并行发展的还有迅速兴起的一批私立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西汉时期著名的私学大师有董仲舒、翟方进、严彭祖、许商等,东汉名师大儒有夏恭、张兴、王充、刘淑、郑云、张奂等,全国各地私学盛行,到处都有经儒讲学和生徒聚众求学的局面。而宋朝的书院更是盛行,中国的书院文化正是在宋朝得到迅猛发展的,其中影响较大的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等。

元明清时期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有所衰落,数量也明显减少,教学水平和学术思想也明显下降,有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算学馆等。这一时期的书院受政府控制比较严格,到了清朝,甚至把书院当成省立大学对待了,实际上各省书院只不过是清朝科举考试的附庸。

先秦时期的大学精神文化“明人伦”、“修己治人”到“以德化人”,因为目的是培养统治者,所以其中倡导的是“明人伦”和“修己治人”的文化。还强调以“德”化民和“修己善群”,重视德育,要求统治者按照“礼”来导民,“修己善群”集中体现在《大学》所提出的三纲八目,三纲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

秦汉三国时期倡导的是“化民成善”、“尤重儒术”、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主要弘扬的是儒家思想,尤其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讲究的是儒家义理,就是维护封建统治与封建道德的根本道理与个人修养工夫的理论,弘扬封建的纲纪伦常、名分等级等永恒不变之“道”。教育是要回归人的“性理”,“诚”是天道也是人道的根本范畴,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人性即是仁、义、礼、智、信。

元明清时期则体现为从“程朱理学”、“明伦明天理”到“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秉承的仍然是程朱理学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封建伦理,弘扬的主流是明伦、明天理,书院有主张“格物为体认天理”的文化,有倡导“心理”、“知行合一”、“启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精神文化,也有“以正心、修身、忠君、孝亲为目的”的精神。清朝政府在高等教育机构大力提倡的主流文化是教学生学做经贤,“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讲究的是“居敬穷理”,追求的是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人”和“通儒”。

2 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特色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大学文化精神都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等显著特

点,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精神特质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的底色。另外,重“道”轻“器”也是中国传统大学文化精神中的一条重要线索^[2]。

2.1 注重社会本位

2.1.1 化民成俗的大学宗旨

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而言,《大学》是一个纲领性文本。《大学》指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亲民”就是通过教育与学习,从而达到修身、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不良风气之目的。“在止于至善”指的是无论个人修身,还是参与社会,都以至善为目标,最终使整个社会都成为“向善”的理想社会。古仁人要使天下的人都成为明明德的人,得先治国;要治国的人,先齐家;要齐家的人,先修身;要修身的人,先端正内心;要端正内心的人,先有诚意;要成为有诚意的人,先致知;而致知在于格物,格物才能知致,知致才能意诚,意诚才能内心端正,内心端正才能身修,身修才能家齐,家齐才能国治,国治才能天下平。从天子到百姓,都以修身为本。内圣外王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而且是古代教育机构的职责。古代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仁人,使社会仁爱太平。“学而优则仕”是汉代太学、国子监和翰林院的目标。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他建议汉武帝学习儒家经典,兴办太学,提倡教化,“正义”与“明道”,这样人们才会懂得礼义,国家才会稳定,进而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太学成为当朝者培养统治人才的一个教育机构,后来逐步演变为国子监和翰林院。无论是叫太学,还是国子监、翰林院,它们都是朝廷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功能都是在为统治者培养统治人才。

2.1.2 政治突出的大学理念

大学确立自身地位有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径,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持认识论哲学的人,把追求知识作为大学的目的。持政治论哲学的人,则把符合国家、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作为为大学发展的首要宗旨。纵观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理念总体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虽然中国古代大学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但在古代中央集权统治的制度下,官学一直是主要的形式,强调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4]。科举制度便是大学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产物且其将这种联系发挥到了极致。在中国古代,读书很少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更多是为了经世济民,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一方面增加了教育和学术的政治关怀,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对纯粹学问的追求,干扰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5]。

2.2 注重伦理人文

2.2.1 仁义和明德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我国古代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都将其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礼义之德”教化学生,形成了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太学一方面要担负推广、传播“儒术”的职责,另一方面还要为国家“择贤任能”。而“贤者”的重要标准就是要德才兼备,德是放在第一位的。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更是如此,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非常看重对学生仁义道德品行的养成。明代中央设立的大学——国子监,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习科目,“监规”规定:“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大学文化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大学文化与东方伦理文化一样,主要强调在群体中的个人思想行为和人际关系,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修养,提倡人们通过修身与学习成为有理想与高尚的人。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

2.2.2 重学的传统观念

“重学”是儒家思想的又一要义。“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所信奉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乐此不疲地设学传道,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其弟子继承师业,广泛传播儒家学说,使“儒以道得民”。董仲舒在吸收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套具有神学色彩的儒家思想体系,主张独尊儒术。在此前提下,设太学用儒家思想培养人才。重学的作用一是在于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二在

于教化民众、文明社会、稳定秩序。“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二千多年前《学记》中的这段话就已道明了设学施教的重要意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表明了教育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学校的社会责任是十分明晰的。

2.2.3 贵和尚中的人本伦理

对大学文化影响至深的传统文化当属“中庸文化”、“和合文化”、“人本文化”^[7]。

中庸之理是儒家根据客观规律制订的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中庸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说是经国治世和治民的大道。《中庸》首篇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倡导只有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朱熹主张按照“中”的方法观察事物,发现真理与规律,达到应有的目的,如用片面、过左、过激的方法去观察事物,从而制订政策,就会造成错误,贻害无穷^[8]。

以“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和合文化是一种哲学世界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智慧的结晶,成为构建大学精神中开放、兼容、凝聚、和谐理念的重要来源。按照和合文化的理念,大到宇宙世界,小到万事万物,甚至包括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本身,都是由“和”产生的;而“和”的产生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和”不仅是多样性的存在,而且是多元统一的整体,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秩序与关系。儒家学说把实现社会与人际的和谐为道德标准,构建和平、和睦、和谐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准则和评价社会协调的尺度。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实现“人和”,第一要“与人为善”,《论语·颜渊》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礼记·坊记》也提出:“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第二要“讲诚信讲和睦,崇尚谦让,去除争夺”。第三要“求同存异”,辨异同,致中和,承认多样性与差异性,再寻求互补和统一。在孔子提出“和为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和”与“同”的差异,并将二者划分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一切正如《论语·子路》所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文化是以为人本,正确看待民众的作用与地位以及处理国家、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人本文化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信任、富民和教化,儒家的“君以民为本”和“民贵君轻论”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人本思想在大学中的体现,就是强调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突出人的发展诉求;在教育教学中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执政者的主要职责是安民,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与基石,这就要求执政者信任民众,更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儒家认为,区别动物与人的根本标准是有无教化^[9]。人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重视人才,善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这是东方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提倡为政在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因素^[10]。

2.3 重“道”轻“器”

《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这种解释,“道”即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以及功用等^[11]。

在中国古代,“道”是无比崇高的,它既是一种道理、规律,也是一种意念、精神。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意思是说世间一切科学道理提出的客观依据是“道”,也是世间万事万物生存、改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孔子的思想中,志向在道,活动在艺,依据在仁,根据在德,在德、仁、道、艺四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志于道”^[12]。因此,为了使真理能够被知晓,就算是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强调最高的人生境界是“士志于道”和“明道济世”。中国古代官立的大学和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以传统道德文化为教学内容,排斥西方传入的“奇技淫巧”。《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孔子儒学以“士志于道,明道济世”和“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为核心的教育理想的集中体现。涂又光在其专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中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是‘艺’与‘道’的矛盾,现在叫做‘科学’与‘人文’的矛盾”,进一步把《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传统大学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科举制

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国子监、翰林院、太学,另一种是由民间学术大师开办的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他们奉行的是以孔子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在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维护泱泱大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教育理想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不能不说,志于道这一看待世界与人生的整全视角对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培养了大批品行高洁、知识渊博的君子。但对“道”的过分热衷,导致对“技”、“器”的轻视,结果阻碍了中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和各种专门技艺的学习和传授。

3 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意义

3.1 传承“修己治人”“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精神

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培养“修齐治平”的士大夫、君子为目标,以化民成俗为宗旨。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提出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各人“从事其所能”,成为利天下的“为义的兼士”。对于这一时期的大学文化,我们需要继承其注重道德修养、以德化人、利济苍生的精神;需要学习其老师不仅在学问上指导学生,而且在人格培养、品性锻造上都起到示范作用的“身正为范”的品质。尽管这一时期的“大学”在形式和管理都远非现代的大学所能比拟,但当时人们求学的热情、教师从教的热情都不亚于今天。这一时期的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求“道”,对每一位学生都要教导他们以整全的知识,这样一种视角对于他们看待世界、看待人世、看待政治乃至看待个人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了这样的教育,受教育者更了解自身、也更了解他人、社会,这样才能完成“修身、齐家、治国”的任务。这种整全视角也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多是一种职业性、专门的技艺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大多只与某种专业的专业有关,对于受教育者的灵魂、对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都较少涉及,这种教育上的缺失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方兴未艾的通识教育或许对解决该问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大学精神中的“利济苍生”凸显出对家国天下的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济世情怀。在市场经济规则泛滥渗透至每一个领域的今天,这种情怀显得尤为可贵^[12]。现代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的重任,这种社会精英不仅仅是专业技术的精英,更应该是有强烈担当意识和济世情怀的社会精英,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领军人物与脊梁的作用。大学就应该把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心忧天下、关注现实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让大学生浸染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3.2 传承人本伦理的教育理念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教育理念的最终目标是“明人伦”,即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追求完美道德、明白做人的道理。它曾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产生过深刻影响,对于现代大学教育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促进个人修养、家庭和谐及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13]。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仍然是文化知识教育,对于道德修养关注不够,而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指引下沦为一种应试教育。给予道德教育的空间太小,导致部分大学生有人格封闭、自我中心、不善于和人交流、不能分享他人的感受等倾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各高校频繁发生,大学生在遇到挫折时常采取不正确的过激应对措施。这些现象提醒我们,现代大学必须要培养大学生的人伦思想和道德情怀。“明人伦”就是我国古代大学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思想。当然,现代社会“明人伦”较之传统社会“明人伦”的范围要大得多。“明人伦”启示我们道德教育的最佳途径是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只有大学生“明”了道德标准、“明”了人伦的社会秩序,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道德行为。“修己治人”就是要更好地审视和修正自己的德行,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做一个好人,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会和谐健康。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正义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现代大学应该要教育大学生,首先应该注意修身,做到“内圣”,然后才能“外王”,去改变他人、改变社会。“内圣”是“外王”的基础,现代大学文化就应该人人注重“修己”,人人从“修己”做起,这既体现大学人追求“真善美”,追求学术的真、追求人文关怀的善、追求自身价值的美,又体现大学人的远大抱负和社会担当。

“回归人之性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教育的本质在于塑造人健全的心智,在于人格的锤炼,灵

魂的陶冶,塑造“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君子。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仅仅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要贴近生活、化为行动,这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相呼应。陶行知先生倡导教育要“回归生活,发现生活,快乐生活”,应当说这背后也有中国传统高教文化的根源。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应当“以人为本”,关照人本身的成长,大学教育的人本回归就是要倡导大学教育少一些功利、多一些人文关怀。大学也应该营造这样的文化氛围,即大学的管理活动、制度设计、物质环境都应该围绕着人的需要出发,为教师的职业发展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软硬环境^[14]。大学文化建设中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让人的需要成为文化建设的第一需要,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3 变重“道”轻“器”为“道器融合”

但我国古代的大学文化过于重“道”轻“器”,认为儒学纲常的“道”优于技术的“器”,专门学问都被视为“奇技淫巧”,拒绝学习和应用,导致我国古代科学不够发达。关于“道”与“器”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大学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辩论,对后来大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古代大学文化中对科学的忽视是我们要加以避免的,经过近代洋务运动等大规模向西方的学习,洋务学堂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为造就实用型外交和军事人才,以西文、西艺为教学内容,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已经改变了重“道”轻“器”的传统,转而走向“道”、“器”融合,将对世界、人生的整全理解与专门知识结合起来。道在器中方为道,器中有道方为器。

另外,我国古代大学文化对社会的“家国天下”式的理解也与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不完全符合,这种“家国天下”的模式也不能在今天照搬照套,需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加以修正与转化。

简言之,对于我国古代大学文化,我们需要继承其修己治人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及师生和谐相处相与从游的教学模式等;而我国古代大学文化中那些适应封建社会的元素,则需要加以鉴别与修正,如“家天下”的观念、“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以及“重道轻器”的传统思维方式等。

参考文献:

- [1] 戴军,娄小平. 中国古代的大学文化[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174-174.
- [2] 蔡剑桥,高晓清. 大学与社会进步关系的缘起[J]. 武陵学刊,2013(6):130-133.
- [3] 周志辉. 校训的道德教育价值的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 [4] 樊继轩. 从“养士用士”到稷下学宫——兼论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过程[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2):23-28.
- [5] 杨兴凤. 杜威与罗伊斯哲学思想之比较——基于杜威1930年3月30日纪念罗伊斯的演讲[J]. 武陵学刊,2014(3):35-41.
- [6] 胡显章.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自觉持续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32(3):12-12.
- [7] 王冀生. 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J]. 中国高等教育,2014(9):8-11.
- [8] 段尊群. “仁智统一”的哲学意蕴与现代启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6):39-43.
- [9] 欧阳康.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J]. 高等教育研究,2008(8):5-10.
- [10] 潘懋元,张亚群. 薪火传承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3(1):5-11.
- [11] 张传燧. 大学之“道”与大学之“器”——传统大学精神解读[J]. 高等教育研究,2005(12):8-11.
- [12] 李孝纯. 谈谈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与时代价值[J]. 江淮论坛,2014(6):25-30.
- [13] 庄梅兰. 传统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经验与启示[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8-22.
- [14] 徐继存. 民国时期教育家的共相[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75-80.

(责任校对 谢宜辰)